

14 07

全南文史資料

(五)

程思遠題

程思遠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全南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全南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全南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目 录

全南游击战争回顾	黄友涯 (1)
游击队在全南的活动	谭启民 (15)
全南人民革命斗争史的十五个“第一”	
.....	陈为民 黄伯龙 (24)
日军侵犯与全南人民的抗日斗争	黄根铭 (28)
王长玑投奔共产党游击队轶事	袁观荣 (36)
回忆龙下的剿匪斗争	钟瑞兰 (33)
解放初期矿区剿匪概况	黄章勇 (50)
镇反运动挖出“剿共模范县长”杜苏桥	
.....	林良愈 邱坚 (55)
全南镇反运动情况简介	林良愈 (59)
矿工宣言抄录	王斯美 (62)
陈余芳进土二三事	陈庭梁 (64)
民国时期全南县财政梗概	胡春旺 (66)
琐谈解放前全南商会组织	李中汉 (73)
大吉山钨矿民窿转国营纪实	黄章勇 (76)
化害为利 保护环境	刘国明 (83)

全南游击战争回顾

黄友涯

全南这个地方，我们党的活动很早就有过，在第一次、第二次特别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活动就很活跃，在黄田江流域这一带有我们党的组织，也有我们苏维埃政权。但后来被破坏了，特别是蒋经国一来，摧残得愈加厉害。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赣南地区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后留下了一部份部队，这就是陈毅和刘建华同志所率领的部队。这支部队在全南边境有过活动，那天在信丰开会时建华同志还讲：“全南的周布我也去过！”在抗日战争期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特别是东江纵队北上和“二王”（即王震、王首道）部队会师之前，那时候，王震、王首道同志带领八千人的精干部队从延安下来准备和南方游击队会师，以便建立“五岭”根据地，准备跟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干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广东所有的游击武装都向“五岭”挺进，那时的全称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下面有：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纵队、琼崖纵队，好几个部队。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的主力部队一部份上来了，并到了全南进行宣传发动。至抗日战争末期，东江纵队集中北撤山东烟台。当时我们党和国民党订了协定，是由美帝国主义进行调停了，根据协定，我们党把江南八个解放区让出来，跟国民党谈判，即“重庆谈判”。就在我党让出八个解放区的同时，我们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以

后，始兴还有个风度大队，也是抗日的，就是他们第一次开进全南进行党所领导的游击队活动。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就是我们的游击部队北撤山东烟台，我们留下的游击队完全转入地下，绝对隐蔽。到了一九四六年秋，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协定，向苏北开了第一枪，向张家口发起了进攻，我们党所领导的“五岭地区”游击队则从绝对隐蔽转向了公开活动。不过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反征队呀”、“抗征团呀！”分散地以各种名义出现。这个时候始兴县有一支我们党领导的“始兴人民反三征大队”到了全南北线的上、下青山、寒洞一带活动。一九四七年秋，五岭地区成立了一个“粤赣湘边人民解放总队”，在江西的信丰油山、大余的帽子峰一带活动，全南是总队的第五支队派出部队在这里活动。全衔是：“粤、赣、湘边人民解放总队第五支队”，第五支队的支队长是邓文礼，政治委员就是我。当时支队都研究，全南这个地方一定要开展，你们看地图，全南这个地方，三面相邻广东，那时风度队有个武工队黄玉井同志，他在信丰开会时讲，他们经常在上、下青山、寒洞一带转来转去。当时，全南这个地方，蒋经国统治相当厉害，在短时间难以发动起来。一九四七年秋，我们第五支队派了一个独立大队，代号叫“河北队”，大队长兼政委是梁奋同志。当时号称一个独立大队，实际只有三十多人。这个独立大队下面设了一个中队，中队长是王老三，小队长是王老大。虽只有三十多人，但都是手枪、步枪装备，人员武器都比较精干。当时这个独立大队的任务是在始兴与全南的边境开展活动，除在始兴活动以外，主要在全南的上、下窖，上、下青山，寒洞、龙源坝一带活动，有一次想打龙源坝伪乡公所，后因过

早暴露了目标，没有打成，在上窖跟江西的保安团打过一次仗，打了一整天，打得相当激烈，是我们“河北队”与当地群众并肩作战，这次战斗，由于敌众我寡，我们牺牲了不少人，敌人打进来，杀人、放火，人民群众遭殃。

我们“河北队”在这一带活动，主要是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宣传解放战争的性质、意义；宣传解放战争我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大力进行扩军，当时上窖就有一个小学老师叫王长玑的参加了游击队。上、下窖，上、下青山一带，山多林密，是我们游击队最好隐蔽、活动的好地方，这里的群众对游击队也很好，当时东江纵队留下一个名叫赖富的就一直住在这里，他是东江人，会讲英语，那是东江纵队北撤因生病留下来了的。那时候在全南扩军不少人参加了游击队，增坊的叶南桥原是小学老师也参加了游击队，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可惜牺牲了；范镜明同志是南康人，他是做木匠的，也在这里参加了我们游击队。全南县参加游击队的很广泛，有小学老师、农民、手工业者。刚来时，“河北队”只三十多人，很快就发展到八十多人，长、短枪增加不少，可以说那时候是“河北队”的全盛时期。到了一九四八年，整个形势起了变化，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过了黄河，一直往南挺进，也就是说，我党跟国民党已由相持转向了反攻的时候了，国民党节节败退，最后退到五岭、“两广”，以“两广”为重点，妄图最后跟我们干，他把希望寄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派宋子文来广东做省长，那时，他也意识到大势已去，在黄河他没办法，东北打不过我们，长江“天险”他也感到危险，我解放大军又要过江了，最后就准备在“两广”做为他的根据地，妄图作垂死的挣

孔。他既想把五岭地区巩固下来，就大肆对我游击队进行扫荡，我们是游击队嘛！合计起来，不过是三、四千人，而国民党调集来的是精锐部队，如：隆昌部队、叶肇部队，还有江西的保安团，广东、湖南等地的反动武装，而且都是美式装备，大举向我游击区进行扫荡。我们最好的武器也只有迫击炮，武器差加上我们指挥人员主观上有缺点，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这样对我们游击队的发展十分不利。面对这一情况，我们部队收缩了，活动地区也收缩了。因此有些不坚定分子自首了，但，这时间甚短，大概几个月的样子，我们称这段时间为艰苦的时期。在这艰苦的年月，我们主要提出如何坚持巩固的问题，巩固，一是巩固人员，一是巩固地区，一直坚持到一九四八年的元月份。由梁奋同志带领的“河北队”在四七年秋进入全南发展了，但由于敌人大扫荡，也只好收缩，我那时受了伤，住在瑶民那里养伤。

一九四八年元月份，我们第五支队支队部进行了研究，决定一定要派部队到全南去扩大地区。我们想，你国民党要搞我们，好，我们就跳到你那个地方去，看你怎么样？我们的游击战争就是这样，所谓内线外线作战，按当时形势，广东始兴一带属内线，我们跳出去，到全南去，扩大地区，把敌人引过那边去。我们扩大地区，争取群众，这是游击战争的基本目的，人多地区广，组织主力部队就好办，打仗就能取得主动，获得胜利。所以为了巩固老区，扩大新区，支队部决定要派一个精干的部队到全南去，则成立了一个叫“烈火队”的武工队，队长是梁奋同志，也就是“河北队”的那个队长，再一个是谭启民同志，下面还配备了一些比较强的小队一级干部，如雷振声、张若海、刘继民等同志。从武器

装备上，配了一挺机枪，过去“河北队”没有机枪，我们现在给“烈火队”配有机枪而且是日本造，同志们习惯叫它“歪把子！”刘详集同志那时只十五、六岁，那时候还配了一些老表，如叶南桥、范镜明等，他们当地较熟悉，由他们带路，另外还配了一个指南针、一幅军事地图。那时谭启民同志是开路先锋，他以前来过全南，情况比较熟悉。这个“烈火队”跟“河北队”的任务不同，“烈火队”武器比较好，人员也较精干，它的任务就是要开辟“三南”的工作，它活动的地区不是边境，而是跳到全南的腹地，要在心腹地带进行活动，它不担负始兴方面的任务，主要在“三南”，以全南为重点。我们第五支队下这个决心要把全南开辟，是根据总队的任务，也根据五岭地委的意图（包括粤北、赣南、湘南这一带），大概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份，“烈火队”就向全南“心腹”挺进了。当时我的伤已经好了，支队部决定为了加强这支队伍领导，就派我参加这个队，因此，我也随队进入全南。那是六月份的一个晚上，我们在始兴澄江集中，由叶南桥同志带路星夜急行军一直到增坊附近一个山头。我们到达后天已经大亮了，我还记得那个山头的树不高，都是小灌木，如果站起来既会暴露目标也会被太阳晒，就只好在那里睡下去隐蔽，这时大家肚子也饿了，后由叶南桥同志化装回家去叫他妈妈煮好饭秘密送到山上来给我们吃。一直到了晚上我们部队才开始到养公坑。当时我们考虑：这个地方背靠佛岭背，后面有大山，前面有大乡村，如增坊、五坊、砂头、中院、水西，再往前走就是县城，后面的大山延伸出去是黄田江流域。这样，我们就慢慢开始在本金乡的养公坑活动。那时这里有个小土匪，外号叫“妖毕”，当然我们是历

史唯物主义者，要辩证地看问题，当时他还是协助我们的，尽管他当时从他个人利益出发，愿意与我们交朋友，抗击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就联系他，团结一切力量，我们就跟他来往，听说他老婆还是广东逃难上来的。我们后来就慢慢到夹水口黄观音同志家里，他爱人不知叫什么名，我一直称她林同志，黄观音的叔叔也常和我们接触。这样我们又一直活动到佛岭背，并以佛岭背为主要地盘。这样，往南边出去有翁江支队派出的部队，往左边出去是全南至龙南的大坝渡口可以收税，后面又与黄田江紧靠，那么跟总队联系也比较方便。同时这一带地形好，尽是山连着山，群众也很好，都是穷苦人，对国民党反动派都是恨之入骨。在这一带有很多香菇厂、纸厂，向他们收一点税可以解决部队给养。我们的任务要扩大地区，要向“三南”伸展，所以“烈火队”的同志如谭启民、范镜明同志就经常在砾头、中院一带活动，他们工作得很出色，游击队和当地群众关系相当密切，四八年春节我们游击队都是在群众家里过的。他们不仅群众工作做得很好，而且统战工作也很有成绩。大家知道全南县的伪县党部书记黄勋卿，我们游击队都可以到他家里去谈判，那时候相对地说，我们游击队的力量还是弱小的，我们能有胆略去和他谈判是不简单的。那时中院的南京大学学生黄其琛也常和我们有来往，对当地伪保长，我们也常去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宣传整个国家形势，向他们指出蒋家王朝已是末日来临，警告他们要识时务，并向他们约法三章。与此同时，我们又不时地组织力量骚扰县城，搞得伪县政府胆战心惊。我和梁奋同志以及机枪班较多时间是在佛岭背一带活动，逐步地也到外围活动，有时为扩大影响，我们就全副武

装在各村庄巡迴，一是显示我军威武，一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一直活动到了信丰的崇仙。当时我们毕竟还没有稳固的立脚点，情况还是若明若暗，要打乡公所还不太容易，当时国民党的自卫队、保安团也甚猖狂。尤其蒋经国在赣南搞强化政策，他的保甲制度严密，情报机构遍布各地，我们部队一到的地方，很快他们就接踵而来，所以我们处境还很困难，环境相当恶劣，有些乡村的地方实力派还和伪政府有专线电话，如墩头的土匪头子谢钦古，他就有一台直通伪县政府的专用电话。有一些伪保长告诉我们，他们也很为难，他说如发现了游击队在他这个区域活动，不报告的话自己有罪，国民党要追究他们，所以我们所到之处想要封锁消息是不可能的。当然，人民群众还是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他们所担心的是我们人太少了。仅从一九四八年六月至十月左右，敌人在江口、社迳、周布、大坝税站等好几个地方来袭击我们，谭启民同志有个统计，比较大的冲突有五次，我们由于为了保存力量，同时也由于敌强我弱，多数总是边打边退，只有在大坝那次，因为地形对我们有利才跟他干了一下，毙了敌营长一名。到了一九四八年冬，天气冷了，“烈火队”大部份人员就抽回澄江去休整，只留下谭启民、范镜明等少数同志在五坊、中院、灵水口、上山、佛岭背一带进行活动，并以这些地方作为主要立脚点。那时我们“烈火队”到外面去跑一跑，但一回到佛岭背这一带就感到无比轻松，这一带不仅山峦连绵较好隐蔽，而且群众也很好。那时候黄观音同志还未参加部队也还算群众，他的叔叔，还有新屋仔的黄娼嫂，香菇厂、纸厂的工人，甚至洪元润的和尚、斋婆都对我们很好，那个和尚我记得他的嘴巴是歪的。由于有

工人、农民群众支持我们，替我们买油盐等日常用品、送情报，我们部队去到哪个村子，群众都能掩护我们，如果要去报告的话，一定要待我们离开了村子很长时间了才会去履行公事地报告一下，这是因为国民党有明文规定，并订有“连坐切结”，不报告，群众会受“株连”。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之所以能在这一带立下脚跟，其根本原因是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那时我们四支队部休整，是开会、学习，会议多、时间拖得长，又是党员会、团员会、支部会，所以一拖就好几个月。那个时候南下大军已逼近长江，国民党从上至下已经很紧张。大概一九四九年三月份左右，我们支队部研究要再组织一支比较大的队伍到全南来，就决定组织一个代号叫“红花队”的队伍。这个队无论从人员和装备都比“烈火队”要大、要强。总共一百多人，其中有一个战斗中队，专门打仗的，由钟礼冠同志任中队长。讲到这里，应先讲一讲全南南边翁江支队派出的队伍和我们如何配合的问题，然后再讲“红花队”的情况。大概是一九四八年十月间，我们“烈火队”正在北线活动的时候，梁增托同志给我讲，粤北支队派了一个独立大队到全南活动，他们的全称是：“粤赣湘边游击纵队翁、连、全、龙独立大队”，大队长是林卧龙，政委刘兰天。当时该独立大队派了一个武工队，也就是只有梁增托同志和手枪队的钟亚苟两个人。他们俩先到墩头，在那里发动群众，做统战工作，首先向墩头的土匪头子谢钦古、袁雅发俩人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宣传我解放大军已开始向南挺进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给他们提出不许干扰我游击队活动的要求，同时也在墩头地区进行收税，

逐步向乌柏坝、古家营挺进并以古家营为重点。这个时候，我们支队谭启民同志便和梁增托同志取得了联系，梁增托同志还亲自到了夹水口和谭启民同志见面，当时主要是商量两支队伍如何配合攻打县城，如何相互配合做好在群众中的宣传、组织工作。现在再接着讲我第五支队“红花队”的情况，刚才讲了“红花队”有一个战斗中队，中队长是钟礼冠、副中队长张亮，下面还有一些小队长是曾春林、雷振声、张若海、刘继民等，配有两挺机枪、一个手枪队，当时刘祥集同志编入了手枪队（小鬼班），一个中队、两个小队合起来大约六、七十人左右。还有一个政工队，政工队长是梁铁同志，政工队队员都是一些大、中学生，是一批文化人，记得有邹学鸣、邱宗富、吴冷、黄洪、王忠、范坚玉（是马来西亚的归国华侨），刘波等十几个人。另外还有一个武工队就是谭启民、范镜明等同志，他们主要活动在县城附近，总计一百多人，我们为支队部的直接领导也参加了。这支队伍一进入全南，便沿着“烈火队”活动过的地区，普遍地走了一圈，主要还是在夹水口、养公坑、上山、佛岭背、黄田江一带。

那时，我们在黄田江流域的统战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毛主席讲过的“三大法宝”：一是党的领导；二是武装斗争；三是统一战线；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大家知道，龙源坝比较大的家伙就是陈水源，他是地方实力派，有一支反动武装，有六、七十人，武器蛮好的，他有四、五个警卫，此人跟始兴澄江的张鉴堂有来往。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一进来就注意做他的工作，我们“红花队”未进入全南之前，就派了邓文畴、徐仁爱、王忠三位同志去做陈水源

的工作。陈也确实有一定社会经历，他闻出了时局的味道，看清了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所以开始倾向我们了；还有一个是广州中山大学回乡学生陈其琛。这两个人，我都亲自给他们谈过话，他俩均表示同情和倾向我们，后来，通过他俩给黄田江流域的一些乡村地主、有名望的上层人士写信，宣传了我党的政策，使这些人有的或表示中立，有的纯粹倾向我们，最低限度也不敢反对我们。比如龙源坝标头的魏卫（后任赣南师专副校长）、半坑刘国栋（当时小学教员）、刘成栋（副保长）、竹山的一个保长邱诗培、陂头的钟泽昌（大学生）、周布一个姓聂的是管全县粮食的，这些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和支持过我们，如那个姓聂的他还拿出光洋、金戒子、金耳环等珍贵财物支持了我们当时的经费。就连全南当时县党部的书记，可以算是个上层了，我们也做了他的工作，还是有成效的。陈水源他不仅在北线有影响，就全南也算有影响、很有实力的，其它乡村里的地主豪绅就说：“哎呀，陈水源都愿意倾向共产党了呀！”其言外之意是说，我们还能比陈水源强？！所以，做好了少数代表性人物的工作，就可带动一大片。在政治上我游击队威望极高，在军事上，像陈水源他有六、七十人的武装，也愿意归顺我们指挥，跟我们一起去打仗。有一次我“红花队”和他们一起在从龙源坝至竹山的叫老水尾地方伏击从全南来的保安团，但由于陈水源的指挥官叫周少英的，敌人还没有进入伏击圈开了枪，暴露了目标没有消灭敌人。

至一九四九年六月，我们在龙源坝地区开始搞了政权建设。在龙源坝成立了军管会，军管会主任是邓文畴，副主任陈其琛。还在龙源坝（地址现在的小学）召开了代表会，附

近村庄的代表都来了，会上我讲了话，会后还散发了“告全南同胞书”（由陈其琛起草，我亲自修改），内容大概是讲解放战争形势、党的政策，号召全县六万同胞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南，解放全中国。从此，贵田江一带包括杨溪、步鸣、文化、江口、龙下、周布等六个乡都属我游击队控制了，当然从军事上我们还不够强大，只不过百把人的队伍，但我们都可以指点江山，可以说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这时，我们的部队则继续在南边的塘坊、中院、五坊一带活动，有时又用机枪骚扰一下县城，散发传单，搞政治攻势，甚至伪县政府都有我们的传单。这个时候全南伪政权已是摇摇欲坠。而我们的大部队如“粤、赣、湘边人民解放总队”的几个主力部队：第六支队（邓国梁支队长）、第三支队（支队长彭新标）、第五支队主力黄景部并由总队政治部主任陈中夫率领都来到了全南。原准备打程龙，后在南亩打了一仗（我们牺牲了一个中队长，名叫叶夫的，在陂头还开了追悼会）。这些部队开到县城附近，好几百人浩浩荡荡，我们有意地每隔二、三米一个人，成一路纵队，排着老长的队伍，机枪、冲锋枪有的是，架势摆得很大，并放空气说：“我们准备打县城了！”把伪县政府弄得人心惶惶，怕得要死。加上这个时候，解放大军快过长江了，这对敌人是莫大威胁，人民群众则欢欣鼓舞。这个时候在南线活动的梁增托部队也甚活跃，在乌柏坝把“五虎将”的统战工作做好了，一些乡保长也不敢怎么了，游击队也从两个人发展到三十多人了，声势不断扩大。他们攻打南迳，破粮仓，救济农民，接着在兴仁乡的古家营成立了军管会，发行胜利公债（解放后已还），在各乡村普遍建立民兵组织。他们活动的范围，在

墩头已扩展到龙南的杨村、太坪，这边从乌柏坝发展到南迳的武合、大庄、古家营一带连成一大片，这样翁江支队的武工队在南线，我“红花队”在北线以至县城附近，形成了对伪县政府的“钳形”之势，伪县政府人员也成了“瓮中之鳖”。可以说，整个全南县，除南迳部份村庄和小慕、城关外，差不多都属我游击队控制住了，这是我游击队在全南的黄金时期。到了八月，南下大军已到达南昌，逼近赣州，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保安团、自卫队纷纷溃退，我“红花队”的战士便出动去打国民党的溃兵，这时国民党军队已是惊弓之鸟，他们已是狼狈不堪，一些穿高跟鞋的官太太，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无奇不有，但一听见枪声就弃枪逃命。所以我们游击队分散出击，每次都是凯旋而归，打了不少漂亮仗。在此我仅举两次为例：一次是政工队的邱宗富、邹学鸣等仅三个人，竟俘虏了散军七、八十人，缴获敌人轻机枪一挺、花机关一挺、美式三〇步枪和加拿大手枪数十支；还有一次是我们的“小鬼班”的小黄，他只十四、五岁，那时比刘祥集同志还小，他到我身边来说：“黄政委，给我一支枪，我去缴数人的武器去！”这个小黄参加游击队不久，我还不放心，还来不及回答，他却命了一支冲锋枪就跑出去，不一会他竟带着二十多个又高又大的俘虏回来。当时我和梁铁同志看了觉得惊奇，本来我打算进去向俘虏讲几句话，可正在这时枪声响了，我们也往山上跑了。

一直到八月十八日，谭启民同志便到全南县城和南下大军四十八师张师长、张政委接头。后来谭启民同志写信给我，我于八月廿一日就带着十几个“红花队”的战士到全南县城和张师长、张政委会师。这样，全南就算解放了。到解

放时我“红花队”在全南，龙南扩编大约有三、四十人，“红花队”从来的时候一百人左右已扩编一百五、六十人，“翁、途、全、龙独立大队”也从两个人发展到三十多人。两支队伍合计起来游击队总数有两百人左右。武器也增加了不少，机枪、冲锋枪、手枪、步枪一应俱全。也就是这一、二百人依靠了全南的群众，在全南站稳了脚跟并打开了局面。当然，主要还是靠大军全南才得以解放，如果大军不来，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的。可以这样说，全南，当时除了城关、小慕、南迳部份村庄外，几乎全县都属我游击队控制了。关于我们部队建制的变迁，开初我们叫“粤、赣、湘边人民解放总队”第五支队，后来，在一九四九年春，我们又改了番号，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纵队长是黄叶，副纵队长是刘建华，政治委员张华，政治部主任陈中夫。当时有好几个纵队，有粤桂纵队、粤赣湘边纵队。我们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是尹任年，他是江西兴国，人，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政协主席，副司令员是黄松坚，政治部主任是左洪涛。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份又改编成立“赣南支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有“赣南支队”，一共成立了好几个支队。我们“红花队”和梁增托同志等在全南活动，所以原决定我们“红花队”叫“赣南支队”。但是“赣南支队”副队长刘建华同志不知道也没有来找我们，我们自己又不知道，我们一直认为还是第五支队领导的，本来是粤北工委领导的，我是粤北工委的委员之一，又是第五支队的政治委员，我抓这个“红花队”一直到解放还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全南除城关、小慕、南迳部份村庄外，几乎全县属游击队控制，游击队活动时间又那么长，全南人民对革命支

持不小，应该把全南划为老区。如果说在全南更老的老区，那应该是墩头、古家营、佛岭背，上、下窖，上、下青山，寒洞等地。